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SSN 2095-6924, CN 36-1328/F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逻辑——基于资溪面包的纵向案例研究
作者：刘建生，彭熙瑜，许越
收稿日期：2025-12-17
网络首发日期：2026-05-18
引用格式：刘建生，彭熙瑜，许越. 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逻辑——基于资溪面包的纵向案例研究[J/OL].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https://link.cnki.net/urlid/36.1328.F.20260515.1718.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逻辑

——基于资溪面包的纵向案例研究

刘建生^{1,2}, 彭熙瑜^{1,2}, 许越^{1,2}

(1.南昌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 330031; 2.南昌大学 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 江西南昌 330031)

摘要：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的整合视角，构建“共创情境—共创行动—共创结果”分析框架，通过梳理江西省资溪面包产业纵向发展历程，揭示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共创推动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逻辑。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外源型赋能与社会力量的内源型赋能共同形塑了乡村产业的共创格局，通过自主驱动机制、组织协作机制、伙伴联盟机制的迭代驱动，推动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实现“机会共创—品牌共创—生态共创”的阶段性演化，进而驱动乡村产业由草根创业形态向规范化、集群化发展阶段跃迁。据此，建议推动政府赋能与社会内生动力协同发力，注重建设基层有为政府，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富民特色产业，同时激发农民自身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主动性，为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长效发展注入可持续活力。

关键词：乡村产业振兴；价值共创；欠发达地区；资溪面包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A

The Practical Logic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 Less-Developed Regions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Zixi Bread

Liu Jiansheng^{1,2}, Peng Xiyu^{1,2}, Xu Yue^{1,2}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2.Institute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f “state – society” relations theory and value co-cre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creation context – co-creation action – co-creation outcome.” By tracing the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Zixi bread industry in Jiangxi Province, it reveals the practical logic through which local government and social actors jointly promote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through collaborative co-cre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xogenous empower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endogenous empowerment of social actors jointly shape a co-creation pattern for rural industries. Through the iterative operation of self-driven,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 alliance mechanisms, rural industrie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undergo a staged evolution from opportunity co-creation to brand co-creation and then to ecosystem co-creation, thereby driving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from grassroots entrepreneurship to standardized and clustered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this study suggests strengthening the synergy between government empowerment and endogenous social dynamics, building capabl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cultivating rural industries that enrich local residents in line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stimulating farmers’ initiative in pursuing a better life, so as to inject sustainable vitality in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Key words: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value co-creation; less-developed regions; Zixi Bread

收稿日期：2025-12-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24ZXSKJD02)

作者简介：刘建生，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乡治理与共同富裕研究，liujiansheng99@163.com。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也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推进成效直接关乎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进程。然而相较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囿于资源禀赋劣势,乡村产业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传统动员模式失灵、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等多重问题^[1],因地制宜推进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需求日益迫切。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接续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在此语境下,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不仅承载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要求,也需要回应农民持续增收的现实诉求^[2]。因此,探索契合欠发达地区发展实际的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已成为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的重要议题。

关于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既有研究呈现以下三种取向。第一,注重外部力量的“带动与帮扶”,聚焦地方政府、龙头企业等强势主体的外部赋能,如强调政府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重视发挥市场主体的优势,倡导构建企业与利益关联者之间的共生关系^[3]。第二,注重对内生资源的“培育与激活”,积极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民企业家、乡村精英等主体的作用,尝试从社会资本积累、乡村精英动员等方面着手探寻有效途径^[4]。第三,注重多重逻辑的“联动与融合”,强调主体融合、内外融合以及线上线下融合,实现市场逻辑、政府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演化平衡^[5]。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地方政府在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也会陷入“动员—失败—再动员”的富民之困以及频繁更替产业结构,陷入“积极的惰性”^[6];以及在缺乏外部制度保障时,脆弱的小农经济常陷入事与愿违的“低端锁定”^[7]。看似矛盾的是在“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并存的结构困境下,有些欠发达地区通过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协同,最终产生了很多代表性的共创成果,例如江西南康家具、宁夏盐池滩羊、湖南新化数码快印。基于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一是在相似的宏观环境与资源约束下,为何有的欠发达地区能突破资源限制、培育出“人无我有”的特色产业,而另一些地区却深陷“低水平均衡”的同质化泥潭?二是为何有的欠发达地区能够释放强大的创业势能,而有的地区却只能被动承受人才流失,陷入产业衰退的恶性循环?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审视,上述差异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能否在特定情境下构建起动态适配的互动机制^[8]。

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产业发展中政社互动的问题,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既有研究将地方政府或龙头企业视为核心驱动力量,而将广大农民等社会力量视为等待被激活或被带动的“沉默资源”;另一方面,既有关于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情境下的本土化探索明显不足。因此,欠发达地区如何在地方政府外部赋能与社会力量内生动能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协同共创的产业振兴路径,值得进一步探讨。基于此,本文整合“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视角,构建“共创情境—共创行动—共创结果”分析框架,基于江西省资溪面包产业发展历程,探究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共创过程和内在机制,为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实践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 理论基础

1. 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中“国家—社会”关系的再思考 在相似的宏观环境和资源约束下,为何不同地区会呈现出“后发赶超”与“低水平陷阱”并存的发展差异?已有研究跳出纯粹的经济视角,将乡村产业发展置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加以审视^[9]。传统“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源自西方分立、对抗的历史语境,逐渐发展出“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对立观点。二者的核心争议在于社会变迁的主导动力究竟来源于国家力量,还是源自社会结构本身。“社会中的国家”视角为突破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提供了重要分析路径。该视角强调二者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相互嵌入、动态互动与彼此形塑^[10]。在此基础上,埃文斯进一步提出“嵌入式自主性”概念,指出发展型政府的制度性特征

不仅在于国家自主性，更在于是否存在制度化管道，使政府能够将其发展战略与政策有效嵌入并落实到社会和企业之中^[11]。由此，国家与社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式治理，成为理解政策转化的关键机制。

中国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社会不仅是经济与生活空间，更是社会自为性与国家形塑性相交汇的政治社会空间^[12]。作为劳动力大量外流、就业机会匮乏的欠发达地区，家庭作坊等微型经营主体率先涌现，催生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草根创业形态。作为产业萌芽的先行者和主要行动者，农民等社会力量以“经营家庭”的方式适应着现代性带来的各种需求。看似纯粹自发的草根生计形态，始终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制度支持与资源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协调资源配置和降低创业门槛，为草根创业的延续和扩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本文将“国家—社会”关系聚焦两类行动主体的互动分析。一是作为“国家”代表、负责政策与资源供给的地方政府；二是作为“社会”代表、从事生产经营的社会力量，主要包括农民创业者、返乡能人、行业协会等，重点关注二者如何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价值共创的互动关系。

2. 价值共创与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 价值共创突破了传统工商管理领域中企业单独创造价值的观点，强调顾客作为共同生产者参与企业生产服务^[13]。随着研究场域拓展与参与主体多元化，价值共创逐渐转移到更广泛的服务系统以及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成为理解公共管理、乡村振兴的重要视角以及牵引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联结机制^[14]，其实质是多主体在互动过程中“合作做大蛋糕”，推动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从散到强”“强而共赢”的稳步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路径。当前学界关于价值共创的研究主要形成两种取向。一是结果导向，关注价值共创“何以实现”，重点分析不同的赋能机制、资源编排方式如何促进企业、地方政府等主体参与价值创造^[15]，以及资源整合与能力协同如何助推地方特色产业的价值共创^[16]。二是过程机制导向，聚焦于价值共创“如何展开”，从DART模型出发，结合本土实践发展演化为“共识—共生—共赢”“观念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赢”等阶段模型，意图描绘多元主体之间价值共创的互动逻辑。

尽管上述研究在推动价值共创理论的在地化应用方面已日益丰富，但对于具体案例动态演化历程的发展机制和运作模式探索不够深入。其一，对价值共创的共创情境讨论不足。现有研究将多主体的协作意愿与资源能力视为既定前提，未能深入解释在资源匮乏、组织能力有限的欠发达地区场域下价值共创何以可能。其二，对过程机制的解释仍侧重于“过程描述”而疏于“机制解释”，对不同阶段中各主体间如何协作等演进机制缺少经验验证。因此，如何在弱基础条件下调动行动主体积极性，整合社会资源进而共创，成为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

（二）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价值共创理论的整合视角，构建“共创情境—共创行动—共创结果”的分析框架（图1）。第一，共创情境是共创行动得以发生的基础前提与牵引动力。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产业振兴往往处于资源禀赋匮乏、组织基础薄弱、市场发育不足的结构性背景之中。基于价值共创的高度情境化特征，本文将共创情境定义为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采取共创行动，形塑产业及区域品牌的约束性、激励性条件总和，涵盖制度情境、资源基础、社会情境与市场情境四类情境。第二，共创行动是共创主体在特定情境下，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策略性互动。本文将共创行动解析为地方政府的“外源型赋能”和社会力量的“内源型赋能”的相互补充，在产业发展的共识引导下，地方政府提供创业机会支持、品牌建设治理、平台培育等方面的支持；而以农民创业者为主的社会力量通过创业机会识别、品牌协同共建、价值认同凝聚等释放创业活力。在外部动能和内部势能相互生成转化的双向运动中，促成了发展产业的集体行动。第三，共创结果是经共创行动耦合赋能后呈现的共创景象，其阶段性行动结果将会影响新阶段的共创情境及共创行动的开展。本文将共创结果划分为机会共创、品牌共创与生态共创三个演进阶段。机会共创是利益相关者在初创起步期共同选择、识别并支持市场机会，实现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品牌共创是利益相关者在持续成长期共同参与品牌标准的制定与维护，实现产业“从有到优”的规范化发展；生态共创是利益相关者在融合发展期依托互惠共生的生态联结关系，贡献关键资源与行动，实现产业“从优到强”的集群化跃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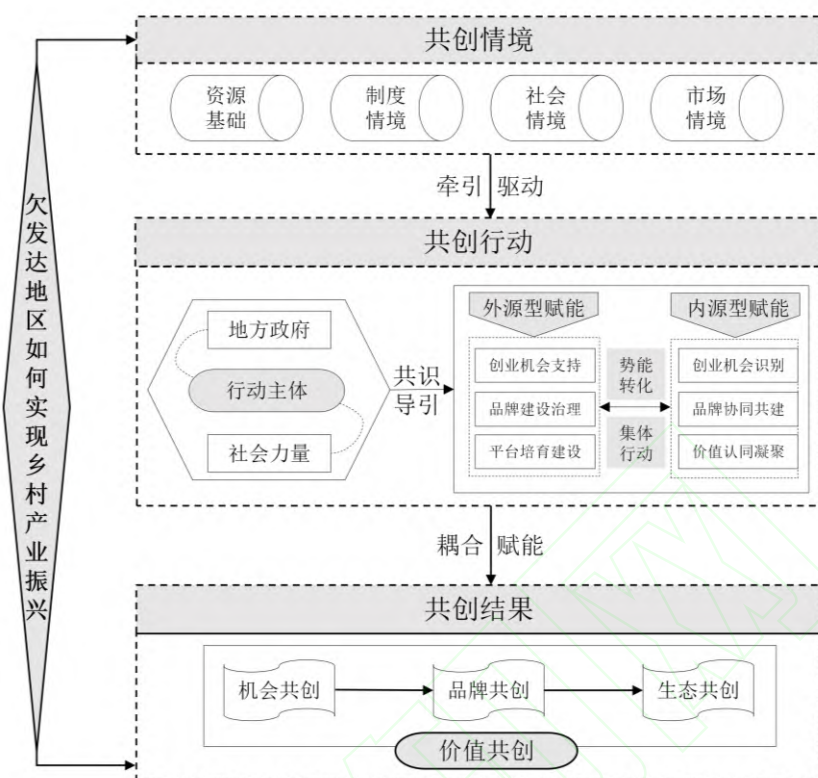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三、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资溪面包产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典型性。资溪作为资源匮乏的“无麦山城”，却孕育出品牌价值超百亿的“面包之乡”，符合理论构建中具有研究价值的“极端案例”特征。其二，符合理论抽样原则。资溪面包产业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地方政府“外源型赋能”与社会力量“内源型赋能”的持续互动与协同演化，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其三，数据具有可获得性。资溪县作为江西省的面包之乡，受到了大量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同时，研究团队于2022年7月—2025年8月开展了多次驻点观察和追踪调研，同时梳理了资溪面包产业的发展历程，以关键事件为时间节点，将资溪面包的产业发展历程划分为初创起步期、持续成长期和融合发展期三个阶段（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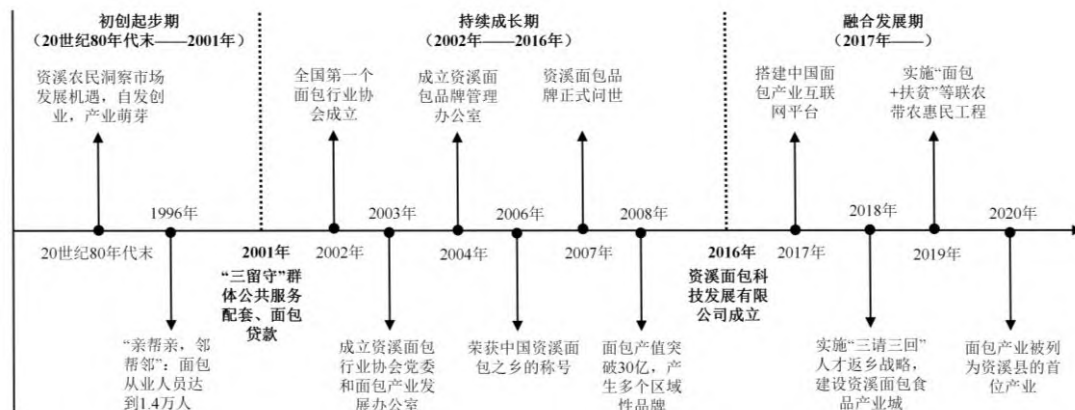


图 2 资溪面包产业发展关键节点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追踪江西省资溪面包30余年的发展历程，揭示欠发达地区产业振兴中政社互动的实践逻辑，并构建具有本土解释力的价值共创过程性理论框架。数据收集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多方数据来源形成资料的三角验证。

1.直接数据 研究团队自2022年起持续关注资溪面包产业，先后于2022年7月、10月，2023年8月，2024年7月及2025年8月赴当地开展调研。期间，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与资溪县面包产业发展办公室等政府部门、重点企业负责人、个体商户及杨坊村村“两委”干部、创业者和农户等50余人进行访谈，累计形成约9万字的有效文本资料（表1）。

2.间接数据 二手资料主要包括内部资料和外部资料。其中，内部资料用于还原产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与政策节点，外部资料用于呈现产业在市场和行业层面的发展状况。不同类型数据相互补充与交叉验证，共同支撑后续的数据分析与理论建构（表2）。

表 1 半结构访谈对象和访谈内容

数据来源	编码	名称	访谈内容	访谈人数/ 人
政府部门	F ₁ -F ₂	县主要领导	产业发展历程及布局策略	2
	F ₃ -F ₅	面包产业发展办公室	产业发展规划	3
	F ₆ -F ₈	乡镇、机关干部	产业联农带农情况	2
	F ₈ -F ₁₁	村级干部	产业发展历程及社会力量的参与	3
面包企业	F ₁₂ -F ₁₅	资溪面包发展有限公司	面包发展史以及与政府的合作	3
	F ₁₆ -F ₂₁	资溪县费氏肉松集团等企业	面包产业市场及发展	5
面包个体商户	F ₂₂ -F ₂₇	爱心面包、佳佳火面包等	面包创业史及与政府的互动	5
农户	F ₂₈ -F ₄₃	本地农户	当地农户家庭生计、面包情怀等	15
其他	F ₄₄ -F ₆₂	协会、出租车司机、餐饮老板等	当地面包文化及从事面包行业等	18

表 2 二手资料数据及编码

数据来源	名称	类别	数量	编码
内部资料（N _n ）	领导讲话材料、规划纲要、年度报告、统计年鉴、工作总结、迎检材料等	文档	35	N ₁
	《资溪面包产业发展史》	书籍	1	S ₁
外部资料（S _n ）	人民网、新华网、江西手机报等媒体的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92	S ₂
	《资溪“面包军团”成功创业的条件因素分析》等	文章	10	S ₃
	《大国强县看资溪》《小崔说事》	专题视频	2	S ₄

四、案例呈现与过程分析

（一）初创起步期：草根创业驱动下的机会共创

在初创起步阶段，农民个体创业者等社会力量出于生计压力与创业增收的内在诉求，自下而上识别并捕捉市场机会，并依托乡土社会中的关系网络迅速组织起一波乡土创业浪潮；地方政府在公共责任与政绩激励的双重驱动下，主动识别并支持草根创业探索，将零散的个体探索汇聚成了得到双方共同认可的产业发展机会，推动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的起步突破。

1.共创情境：资源约束与生计需求促发早期创业动因 资溪县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境内东部、武夷山脉西麓，是一个靠山吃山的山区县，当地群众过度砍伐导致生态环境破坏。20 世纪 80 年代末，地方政府为保护山林资源实施严格限制，资溪陷入“工业不成、农业难为”的发展困境。基层社会对产业机会的回应深刻植根于以家庭生计为核心的行动逻辑之中，农民群体出于改善家计的迫切需求，任何可见的增收机会

都会被迅速捕捉并在乡土社会内部扩散。与社会力量的生计逻辑相对应,受压力型体制与属地发展责任机制的共同塑造,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也成为地方政府兼顾政绩考核与公共利益的可行选项。

2. 共创行动与结果:草根创业与政府回应式赋能实现产业“从无到有”

资溪面包产业的起点源于本地农民依托乡土关系网络率先捕捉外部市场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资溪县两名退役军人张协旺、洪涛通过军地技能培训掌握面包制作技术,并在邻近铁路枢纽城市鹰潭开设面包店,一年后面包店年盈利达3万元,做面包带来的“财富密码”被越来越多敏锐的当地人知悉。然而,早期的创业逐利行为并非原子化的无序竞争,创业机会的识别与扩散深刻地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依托“师傅带徒弟、亲邻帮亲邻、老乡帮老乡”的模式,形成“一姓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一县”的辐射效应。熟人社会中的信任关系显著降低了技术学习成本和市场进入门槛,外出创业成为资溪群众广泛模仿的集体行动。“我们村有人先开始做面包,确实赚到钱了,亲戚、邻居就跟着一个带一个地学。谁先学会了,就手把手教亲戚朋友,大家慢慢都做起来了,(我们村)基本上家家都有面包店。”(F31)

随着草根创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溪政府逐步意识到民间自发形成的“面包经济”所蕴含的发展潜力。1997年,资溪县政府成立专项调研组,围绕创业者普遍面临的技术不足、资金短缺、土地闲置及家庭照护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回应式政策措施,补足农民自发创业过程中的短板。一是通过土地流转、代耕制度等方式,解决外出农民的土地闲置问题;二是配套提供寄宿制小学和老年公寓等公共服务,回应“三留守”问题;三是通过设立面包培训学校和提供小额创业贷款,降低技术与资金门槛,增强创业的可持续性。“我们搞这个(面包产业),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真有这个需求。要是政府不出手,他们缺技术、缺资金,发展到一半可能就掉下去了。我们这里资源有限,招商又难,把本地产业扶起来,也是给老百姓找出路。”(F1)

(二) 持续成长期:市场压力驱动下的品牌共创

在持续成长阶段,资溪面包产业的区域影响力逐步提升,但随之而来的市场竞争加剧、品牌形象分散与技术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也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现实约束。在此阶段,创业个体与地方政府逐步意识到,单靠分散经营已难以应对外部竞争,推动组织化协作与品牌共建成为产业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

1. 共创情境:市场扩张与规范诉求催生产业组织化需求 随着资溪创业群体持续外出开店,面包店数量快速增长,创业者直接面对来自外部市场的竞争挤压、地方保护、行业标准不统一等新挑战。一方面,外地商户的排斥、商业纠纷频发以及经营环境的不稳定,以家庭作坊为主的经营模式在跨区域竞争中暴露出明显脆弱性。另一方面,面包口味、质量标准、技术水平差异显著,使“资溪面包”缺乏统一形象与稳定品质,难以形成长期竞争优势,由此对组织协调、品牌保护与制度支持提出迫切需求。

2. 共创行动与结果:组织协同与嵌入式治理实现品牌“从有到优”

在持续竞争压力下,创业群体逐步认识到,早期“单兵作战”的扩张路径虽能带来短期收益,但难以支撑产业长期发展。围绕共同应对市场风险的现实需求,创业者自下而上推动行业协会、异地商会等组织建设,通过统一标准、规范经营和品牌共建,强化群体联结与集体行动能力。更重要的是,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成为连接异地创业者的关键纽带,通过定期培训、经验交流等方式,形成了以技术共享、资源共用为核心的协作文化。“以前在外面开面包店很危险,经常有人砸店。但如果我们村里谁被欺负了,大家会一起来帮忙。背后有‘娘家人’撑腰,也慢慢站稳了脚跟。”(F25)

与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行动相呼应,地方政府逐步认识到,面包产业有可能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面对集体商标缺失、技术标准滞后与外部品牌竞争挤压等问题,资溪政府首先通过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品牌塑造等方式,推动资溪面包由分散经营逐步转向品牌化发展。2005年,资溪县政府成立“江西资溪面包科学技术研究院”,专注于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2007年,成功注册“资溪面包”集体商标,为品牌提供了法律保护 and 品质背书。其次,构建跨地域的市场支持与服务网络。政府创造性地在面包门店集中的大中城市派驻干部担任“联络员”,一方面协助创业者应对法律纠纷、维护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推动外地商会的组建与规范运作。“传统的资溪面包单靠夫妻店、父子店形式很难走得长远,政府要在产业

发展过程中强化管控和标准建设。商标注册、品牌文化、企业经营模式，都需要通过统一规范，改变过去那种各自为战的松散局面。”（F4）

（三）融合发展期：全链整合驱动下的生态共创

在融合发展阶段，遍布全国的资溪面包门店虽显著提升了区域品牌影响力并带动农民增收，但也逐渐暴露出产业价值外溢、本地承接不足的问题。大量产业收益未能有效反哺县域发展，形成“富民不强县”的结构性矛盾，被形象地称为“行走的GDP”。在此背景下，推动产业价值向本土深度回嵌，成为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面对的发展命题。

1. 共创情境：强县发展与富民增收促发产业融合升级 随着资溪面包品牌扩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相继涌现，催生了泸溪河、麦香人家等知名品牌。然而，这些企业与资溪本地的产业联结较弱，税收与主要经济效益多留存于企业所在城市。同时，资溪县内缺乏烘焙原料、包装及设备配套产业，产业链条不完整，制约了产业长期发展。破解“品牌外溢、价值外流”的困境，亟须将生态资源、乡村旅游等本地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构建可持续的县域产业生态。

2. 共创行动与结果：精英回嵌与平台构建实现生态“从优到强”

随着“资溪面包”品牌认同不断强化，部分成功创业者将情感认同转化为返乡投资行动。以钟启文为代表的产业精英于2018年返乡创立资溪面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导产业园区建设，将成熟的经营体系回嵌本地。2019年，鲍师傅品牌响应资溪“三请三回”战略，在当地投资建设生产基地，显著带动就业与产值增长。“钟老板回来资溪再创业还是冒了风险的，想为家乡做一点事。他原本在绍兴发展的已经很成熟了，打动他回来资溪投资的应该是家乡情怀，但也和资溪政府招商引资密不可分。”（F9）

针对产业价值外流问题，资溪政府将治理重心由扶持个体创业转向构建产业生态。首先，资溪政府着力推动产业链本地延伸与配套。通过建设面包产业城、电商基地和特色小镇等平台，推动原料、包装、物流、研发等环节向本地集聚，逐步补齐产业链短板。其次，依托品牌优势和生态资源，探索“面包+农业+文旅”的融合路径，拓展产业多元结构，并通过“面包+扶贫”等机制，引导产业收益反哺乡村发展，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同提升。“我们不止把创业面包大户请回来，而是整个产业链一起引回来。从设备到模具、再到包装，都是通过这些回乡的人带头，我们政府再去帮着招商，把链条真正拉回到资溪来。”（F4）

五、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价值共创的实践逻辑

（一）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价值共创的动态赋能演化过程

基于资溪面包产业的纵向案例研究可知，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价值共创呈现出社会力量“内源型赋能”与地方政府“外源型赋能”持续耦合的动态演化逻辑。在资源基础、制度情境、社会情境、市场情境等共创情境下，推动行动主体扩容，为共创行动提供结构性张力与触发条件。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甄别不同时期的情境约束，动态调整价值目标并匹配差异化行动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共创行动不仅带来了价值共创的阶段性竞争优势，还为下阶段注入了新的比较优势及新情境约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实现螺旋式上升（图3）。

欠发达地区受资源基础薄弱、市场体系不完善、社会组织能力不足等现实约束，仅靠基层政府的单向政策供给难以推动产业实现赶超式发展；而分散的社会力量受限于资源禀赋，亦难以独自突破“低水平均衡”的低端锁定^[17]。而乡村产业振兴的本质是地方政府作为“权力主体”与社会力量作为“能动主体”在特定时空情境下形成动态双向赋能与价值共创关系。在资溪案例中，地方政府将创业农民、行业协会及返乡精英等社会力量视为关键协同主体。鉴于欠发达地区市场发育不完善，政府并未采取单纯管控逻辑，而是运用行政管理权与资源配置权，通过引导、赋能与监督，探索政社嵌入的适宜边界，以实现政策供给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匹配；社会力量则依托社会资本与乡土信任，在与基层政府的持续互动中弥补政府在市场敏锐度与经验扩散方面的不足。

正如政府过程理论指出，政府治理是复合并渐次展开的“过程”。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嵌过

程, 同样经历了从松散式互嵌到协同性互嵌, 最终达到制度化互嵌的阶段性演化^[18]。在初创起步期, 农民群体基于生计压力和乡土网络自发识别市场机会, 地方政府对草根创业活动保持观察与支持的态度, 提供基础性政策回应, 双方嵌入关系较为松散; 在持续成长期, 随着产业扩张与组织化需求上升, 地方政府与行业协会、异地创业群体等主体围绕共同目标逐步形成更具稳定性的协作结构, 通过制度供给、品牌治理与行业规范强化产业秩序; 在融合发展期, 返乡创业精英、供应链企业等新主体加入, 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转向“制度化互嵌”, 形成规则明确、分工稳定的协同机制, 为产业生态跃升奠定制度基础。同时, 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的角色功能也随互动深化而持续升级。随着互嵌关系由松散走向协作再到制度化, 地方政府逐步由早期的政策制定者转向产业发展的引导协调者、资源链接者与全周期服务者; 社会力量则从依托乡土网络的分散经营主体, 成长为遵守行业自律、标准共建与品牌共护等功能的组织化力量, 二者在协同演化中相互补位, 共同推动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实现价值共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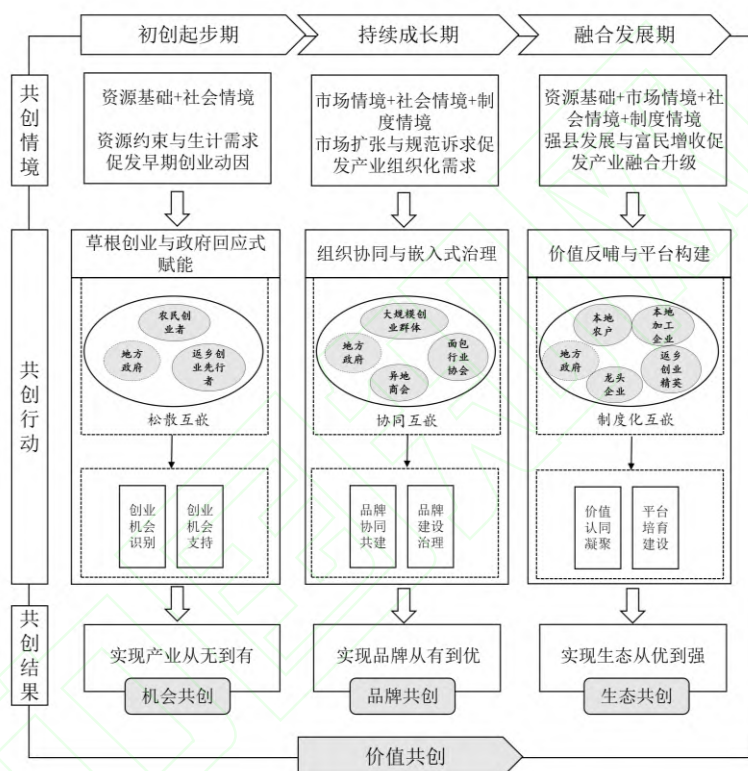


图 3 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实现价值共创的过程模型

(二) 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价值共创的驱动机制及其“义—利”价值转换

资溪面包产业从“机会共创—品牌共创—生态共创”的演进过程, 主要依托自主驱动机制、组织协作机制与伙伴联盟机制三个递进式驱动机制。在机制链条内部, 社会关系、集体利益与价值认同共同作用, 推动产业动力由“利的驱动”向“义的融合”转化。一方面, 地方政府作为产业发展的关键引导者, 持续激活“有为政府”的治理作用; 另一方面, 社会力量作为重要能动主体, 依托关系网络、社会组织与身份动员, 为产业注入“有机社会”的内生活力, 推动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跃迁(图4)。

1. 自主驱动机制: 乡村产业机会共创的内生动力激活 自主驱动机制建立在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共识一致的基础上, 通过社会力量的内生激活和地方政府的制度确认, 实现乡村产业从无到有的机会共创。受制于信息不对称与技能约束, 欠发达地区农民获取外部市场和新业态机会的能力有限, 而以亲缘、地缘为纽带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其提供了最初的信任基础, 有效降低了创业合作成本, 成为激活创业内生动力的关键机制。在改善生计的逐利动机驱动下, 农民创业者借助既有社会关系实现创业扩散^[19], 地方政府则以回应式赋能介入创业实践, 促成自下而上机会识别与自上而下制度支持的正向耦合。

2. 组织协作机制: 乡村产业品牌共创的集体行动策略 组织协作机制通过将分散主体转化为协同主体,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由“零散扩散”迈向“集体行动”。借助行业协会、异地商会等中介组织的构建, 乡村

产业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市场网络，使原本分散的家庭经营主体被整合为具有共同规范、共同利益与协同能力的产业群体，有效突破了传统家庭经营在规模与组织上的局限。同时地方政府由早期的响应性扶持逐步转向嵌入式治理，通过提供法律维权、质量监督与市场推广等治理服务，构建起柔性的行业调控机制，为新兴公用品牌提供必要的合法性与公信力背书。

3. 伙伴联盟机制：乡村产业生态共创的共建共治共享 伙伴联盟机制以多元主体的价值认同为纽带，以产业生态的系统构建为目标，推动产业发展由单一价值提升转向多元价值共赢。生态共创体现为社会力量的价值认同凝聚与地方政府的产业平台建设相结合。返乡创业者的行动并非完全出于政策动员或短期利益考虑，而是融合了长期发展预期与情感认同，在反哺乡土的动机下，将资本、技术和声望重新注入本地产业体系。地方政府则通过现代产业园建设、全产业链完善、营商环境优化等，持续整合各类资源进入乡村产业系统，实现对农业、文旅等资源的集成化配置。

4. “义—利”价值转化：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价值共创的本土逻辑 在资溪面包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呈现出“义—利”双重属性，并经历了由“逐利兼义”向“义利并举”再到“义利相容”的动态转化。在初创起步期，个体创业者多源于改善生计的逐利动机，但在乡土社会结构中，其经济行为会受到地缘、亲缘等构成的非正式关系网络的调节，嵌入于熟人社会、亲邻网络构成的关系信任体系中^[20]，使逐利行为天然兼具道义属性。在持续成长期，随着竞争加剧与风险外部性增多，社会力量由个体行动转向集体协作，通过将基于私人关系的老乡网络升级为正式注册的异地商会，实现了从非正式关系向制度化组织的转变，呈现出“义利并举”的特征。在融合发展期，返乡创业精英的经济行为动机逐渐融合情感认同与长期利益考量，个人发展诉求与产业发展目标趋于耦合，呈现出“义利相容”的行动逻辑，为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深层价值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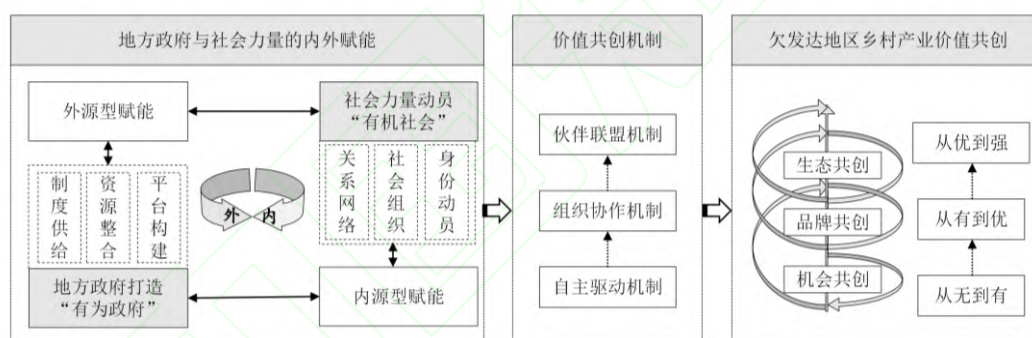


图4 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

六、结论与讨论

整合“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价值共创理论，构建“共创情境—共创行动—共创结果”分析框架，基于江西省资溪面包产业发展历程，分析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逻辑，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从共创情境看，乡村产业发展受到资源基础、制度情境、市场情境与社会情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塑造，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境决定了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所采取的共创行动。第二，从共创行动看，地方政府作为“权力主体”与社会力量作为“能动主体”，二者通过“自主驱动—组织协作—伙伴联盟”的机制演进，推动价值共创持续深化。第三，从共创结果看，乡村产业经历了“机会共创—品牌共创—生态共创”的阶段性演进，最终实现由草根创业形态向规范化、集群化发展阶段的跃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乡村富民产业。产业培育需立足本地社会基础与乡土文化禀赋，以“富民”为导向塑造差异化比较优势，重点支持根植于地方社会网络、能广泛吸纳农民参与，同时契合地方发展规律和农民利益的产业项目。其次，以农民为主体，推动政府赋能与社会内生动力协同发力。既要通过政策支持、制度供给等外部力量改善发展条件，更要激发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内生追求，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建设基层有为政府，既要避免过度干预

或监管缺位,又要通过产业布局优化等方式,对产业进行甄别、规划、扶持。最后,找准基层政府的产业角色定位,推动其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鉴于欠发达地区市场与社会组织能力相对不足,基层政府应从家长式管理理念转向伙伴式的政策服务理念,在初创起步期侧重机会识别与资源倾斜,通过“扶上马”帮助产业起步;在持续成长期强化品牌培育与标准建设,通过“送一程”促进产业集聚;在融合发展期着力平台建设和生态构建,推动产业实现价值跃升。

参考文献:

- [1] 吴彬,徐旭初,徐菁.跨边界发展网络: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逻辑[J].农业经济问题,2022(12):59-72.
- [2] 李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产业帮扶类型与成效:以鄂西南少数民族自治州脱贫村产业帮扶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6):34-46.
- [3] 周展.“嵌入式干预”:县域特色农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4(12):131-44.
- [4] 张社梅,邓杰豪,王舒,等.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研究:基于四川天府新区T村的纵向案例[J].农业经济问题,2025(6):131-144.
- [5] 刘小峰,彭扬帆,徐晓军.选优扶强:老少边区特色农业“一县一业”格局何以形成[J].管理世界,2023,39(7):46-63.
- [6] 王春光,单丽卿.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基于西部某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3):38-47.
- [7] 林雪霏,陈昭霖,郑慧玲.权变型乡土社会网络与乡村产业集聚发展锁定:基于福建省白沙村紫菜产业“农贸模式”的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24(6):79-97.
- [8] 魏程琳.政府干预转型与乡村产业发展:基于国家农民关系重构的视角[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8(3):108-119.
- [9] 吴光芸,周芷馨.双向增权:数字平台何以赋能乡村产业振兴?[J].电子政务,2024(9):102-113.
- [10] Joel S ,Migdal.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by Joel Migdal[J].Journal of Politics,2001,38(3):590-591.
- [11] Evans P B.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M].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2012.
- [12] 贾玉娇,张译文.差序动员:乡村社会发展干预力转化为内生力的逻辑[J].社会学评论,2025,13(1):172-194.
- [13] Wikström S.Value creation by company-consumer interac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1996,12(5):359-374.
- [14] 张梅梅,吴春梅.共同富裕导向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普惠共享与价值共创[J].农村经济,2024(5):43-54.
- [15] 张德海,傅敬芳,陈超.现代农业价值共创:社会动员与资源编排:基于新会陈皮产业的案例观察[J].中国农村经济,2020(8):13-26.
- [16] 张德海,金月,杨利鹏,等.乡村特色产业价值共创:瓶颈突破与能力跃迁:基于本土龙头企业的双案例观察[J].中国农村观察,2022(2):39-58.
- [17] 杨再苹,李棉管.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及其突破:川西B县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23,16(5):4-25.
- [18] 汤临佳,蒋子燕,赖惠能.以“政府—平台”功能互嵌驱动脱贫地区新内源式发展的机理研究:基于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案例的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5,22(2):128-140.
- [19] 薛永基,杨晨钰婧,张圆圆.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农村创业扩散何以驱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25(3):41-60.
- [20] 黄思.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基于闽南D村瓷砖产业的考察[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20(4):534-541.